

关于“中国哲学之 正当性问题”的一个批注

□李明辉

摘要:“中国过去是否有哲学?”这是个老问题,但最近却在关于“中国哲学之合法性(正当性)”的讨论中被重新提起。这个问题涉及“哲学”的定义。针对这些讨论,本文作者提出两个思考的角度:第一,我们必须区分“作为思想传统的哲学”与“作为现代学科的哲学”;第二,即使将“哲学”视为一个“思想传统”,它在西方历史上也是一个历经变化的概念。根据第一点,作者主张:中国历史上确实存在“作为思想传统的中国哲学”,又同时承认:“中国哲学”这门学科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根据西方的模式“建构”起来的。根据第二点,作者主张:传统的“中国哲学”最接近古代希腊、罗马哲学中“哲学作为生活方式”的意义。

关键词:中国哲学 作为思想传统的哲学 作为现代学科的哲学 作为生活方式的哲学

Abstract: The old question, whether there was “Chinese philosophy” in traditional China, was raised again in connection with the recent discussion over the “Legitimacy of Chinese Philosophy”. This question is related to the definition of “philosophy”. In face of this discussion, I provide two new points of view: First, it is necessary to distinguish between “philosophy as an intellectual tradition” and “philosophy as a modern discipline”. Next, even the “philosophy as an intellectual tradition” was a changing concept in Western history. According to the first point of view, I affirm the existence of “Chi-

nese philosophy as an intellectual tradition” in the past, acknowledging that the discipline of “Chinese philosophy” has been “constructed” by modern Chinese intellectuals on the Western model. According to the second point of view, I assert that traditional “Chinese philosophy” is the most akin to the “philosophy as a way of life” in the Hellenistic philosophy.

Key words: Chinese philosophy, philosophy as an intellectual tradition, philosophy as a modern discipline, philosophy as a way of life

近年来,所谓“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忽然成为中国大陆学术界的热门议题。首先要指出:此处使用“合法性”(Legality)一词并不恰当,应当之以“正当性”(Legitimacy)一词。这两个概念的含义不同,不可混淆。这场讨论是由郑家栋于《中国哲学年鉴》2001年号所发表的《“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一文所引发^①。此后,大陆学术界针对这项议题举办了不小大、小型的研讨会。还有不少期刊刊载了相关的论文,甚至以笔谈、专题讨论等形式进行相关的讨论。例如,2003年10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中国哲学研究室与首都师范大学哲学与文化研究所共同举办了“中国哲学:观念与学科”国际学术研讨会。2006年12月,深圳大学国学研究所与澳洲国立大学亚洲研究院在深圳共同主办“‘中国哲学’建构的当代反思与未来前瞻”国际学术研讨会。笔者也出席了这场研讨会,并且发表论文《再论中国哲学的“创构”问题》。此外,根据笔者手头的有限资料,《山东社会科学》2002年第4期刊载了《“中国有无哲学”问题笔谈》,《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刊载了《“走出中国哲学的危机,超越合法性问题”专辑》,《江汉论坛》2003年第7期刊载了《“中国哲学”的“合法性”反思与“主体性”重构笔谈》,《天津社会科学》2004年第1期刊载了《“中国哲学学科的建设与发展”笔谈》。此外,《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24卷第1期(2007年1月)选刊“‘中国哲学’建构的当代反思与未来前瞻”国际学术研讨会的部分论文,《学术月刊》第39卷第3期(2007年3月)亦刊载了该会部分论文的节本。

中国哲学的正当性问题关联到另一个问题,即是:中国过去是否有哲学?因为如果中国过去并无哲学,而哲学是西方文化的产物,则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脉络中讨论“中国哲学”便无正当性。然则,所谓的“中国哲学”其实是“哲学在中国”,亦即来自西方的哲学在中国之移植,或者说,近代中国人根据西方的模式所“创构”的哲学。

“中国过去是否有哲学?”这个问题其实并不是一个新问题。在中国,清末以

^① 此文后为《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02年第2期所转载。

来便不时有人提到这个问题。在西方,自17世纪的启蒙运动以来,亦不乏哲学家与汉学家讨论这个问题。1949年以后,在台湾、香港地区及西方,这个问题虽未成为热门议题,但仍不断有学者对这个问题表示意见。譬如,在牟宗三先生1963年出版的《中国哲学的特质》一书中,第一讲便是《引论:中国有没有哲学?》。在此,他强烈反驳“中国没有哲学”之说,但同时强调其重点与西方哲学不同:中国哲学特重主体性,是以生命为中心^②。1991年德国汉学家傅敏怡(Michael Friedrich)在一篇题为《论中国哲学之创构——现代儒学的一项课题》(De Inventionem Sinarum Philosophiae. Ein Thema des modernen Konfuzianismus)的研讨会论文中也讨论过这个问题。他认为:所谓的“中国哲学”并不存在于近代以前的中国传统文化中,而是近代中国学者在接触了西方哲学之后“创构”出来的,故只是“哲学在中国”。这篇论文并未正式发表,但当时有一位大陆学者还学文在台湾《当代》杂志转述了这篇论文的主要观点^③。笔者则根据还学文的转述,发表了《中国没有哲学吗?——与费德西先生论“中国哲学”》一文,以响应傅敏怡的说法^④。其后,法国汉学家兼人类学家杜瑞乐(Joël Thoraval)也发表了《中国哲学?——从哲学在中国到“中国”在哲学》一文^⑤。德国汉学家兼哲学家罗哲海(Heiner Roetz)则发表了《有没有中国哲学?》一文,强烈反驳“中国过去没有哲学”的观点^⑥。这些讨论均发生于大陆学界提出“中国哲学的合法性(正当性)问题”之前,可见大陆学界提出这个问题,具有补课的性质。但是大陆学者在针对这个问题发言时,多半忽略了过去的相关讨论,而呈现出明显的历史断裂。

这个问题之所以出现于21世纪初的大陆学界,实非偶然。从1949年起,中国大陆经过30年的自我封闭之后,于1970年代末期重新对西方世界开放。在往后的20年间,大陆的知识界面对西方文化的直接冲击,产生如何自我定位的问题。

② 参阅牟宗三:《中国哲学的特质》(收入《牟宗三先生全集》,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3年,第28册),第1—8页。

③ 还学文:《西方“哲学”阴影下的新儒家——德国汉学家费德西关于新儒学的述评》,《当代》,第65期(1991年9月),第110—125页;收入仲维光、还学文:《意识形态阴影下的知识分子》(Bochum:Brockmeyer,1994),第200—212页。“费德西”是还学文加诸Michael Friedrich的中译名。

④ 刊于《当代》,第66期(1991年10月),第142—149页。

⑤ Joël Thoraval:“Chinesische Philosophie? Von der Philosophie in China zu ‘China’ in der Philosophie”, *Lettre Internationale*, Nr. 41 (1998), S. 61-67.

⑥ Heiner Roetz:“Gibt es eine chinesische Philosophie?”, *Information Philosophie*, 2002, Heft 2, S. 20-32. 作者后来将此文改写为英文稿:“Philosophy in China? Notes on a Debate”, *Extrême-Orient, Extrême-Occident*, 27 (2005), 49-65.

中国哲学的正当性问题其实便是一个自我定位的问题。台湾与香港当然也有自我定位的问题,但由于这两个地区始终未曾断绝与西方世界的联系,故可以较从容地面对这个问题,中国哲学的正当性问题也因而并未成为热门的议题。

中国哲学的正当性问题在大陆学界出现之后,也引起了西方汉学家的注意。例如,比利时汉学家戴卡琳(Carine Defoort)先针对这个问题发表了《到底有没有“中国哲学”这样的东西?——一场隐性辩论之论证》一文^⑦。这篇论文引发了爱沙尼亚学者饶德(Rein Raud)的一篇响应论文《诸哲学对哲学:维护一个弹性的定义》^⑧。戴卡琳随之发表《“中国哲学”是个恰当的名称吗?——回应饶德》一文^⑨,答复其质疑。这场讨论以饶德的再度响应而暂告结束^⑩。此外,戴卡琳与葛兆光为《当代中国思想》(*Contemporary Chinese Thought*)挑选了一批相关的中文论文,译成英文,编成“中国哲学的正当性”(The Legitimacy of Chinese Philosophy)专辑,刊于该刊第37期第1—3号(Fall 2005—Spring 2006)。法国学者程艾蓝(Anne Cheng)也为《远西·远东》(*Extrême-Orient, Extrême-Occident*)编辑“是否有中国哲学?问题的现状”(Y a-t-il une philosophie chinoise? un état de la question)专辑,刊于该刊第27期(2005年)。

既然中国哲学的正当性问题涉及中国人自我定位的问题,它便不免涉及民族情感与文化认同的敏感问题。因此,有不少论者强调:主张“中国过去有哲学”的中国人系出于民族情感,持相反论点的西方人往往是西方中心论者。这种说法虽有部分真实性,但却过于简化了真实的情况。否则我们如何解释西方学界亦有人主张“中国过去有哲学”的观点(如罗哲海),而中国学界亦有人质疑此一观点(如马一浮、欧阳竟无)^⑪? 还有学者宁可以“中国思想”来取代“中国哲学”一词,以避

⑦ Carine Defoort: “Is There a Thing as Chinese Philosophy? Arguments of an Implicit Debate”, *Philosophy East & West*, Vol. 51, No. 3 (July 2001), 393-413. 此文有杨民、季薇的中译:《究竟有无“中国哲学”?》,《中国哲学史》,2006年第2期,第5—16页。

⑧ Rein Raud: “Philosophies vs. Philosophy: In Defense of a Flexible Definition”, *Philosophy East & West*, Vol. 56, No. 4 (Oct. 2006), 618-625.

⑨ Carine Defoort: “Is ‘Chinese Philosophy’ a Proper Name? A Response to Rein Raud”, *Philosophy East & West*, Vol. 56, No. 4 (Oct. 2006), 625-660.

⑩ Rein Raud: “Traditions and Tendencies: A Reply to Carine Defoort”, *Philosophy East & West*, Vol. 56, No. 4 (Oct. 2006), 661-664.

⑪ 《尔雅台答问》,卷1,《答许君》,见《马一浮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1996年),卷1,第527页;欧阳竟无:《佛法非宗教非哲学》,收入黄夏年编:《欧阳竟无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第1—13页。

免“哲学”一词可能造成的误解与争论(如葛兆光)^⑫。分析中国哲学的正当性问题所反映的情感因素与意识形态因素,固然有助于了解相关的说法出现之历史背景,并据以评价它们,但笔者不打算从这个角度来讨论这个问题。在本文中,笔者拟从“哲学”这个概念的含义出发,对笔者过去的相关论述提出补充说明。

众所周知,“哲学”一词并非中国固有的名词。日本学者西周(1829—1897)最早于1866年出版的《百一新论》中以汉字将希腊文的 *philosophia* 一词译为“哲学”^⑬,其后为中国知识界所广泛采纳而通行至今。诚如戴卡琳所言,“那些在传统上归属于诸子的典籍,连同儒家的经书一起,从周代一直到19世纪,都通过追溯的方式被冠以了‘中国哲学’之名”^⑭。有一种简单但却流行的推论是说:既然“哲学”一词起源于希腊,而中国人直到近代才从西方引进此词,这便证明中国传统文化中并没有哲学。但这种推论是有问题的,因为一门学问之出现与这门学问之命名是两回事。例如,西方的“存有论”(Ontologia)一词首度出现于1613年德国人葛克伦布斯(Rudolf Goclenius, 1547—1628)所编的《哲学辞典》(*Lexicon philosophicus*),但在古代希腊哲学(如亚里士多德哲学)中早已有存有论。又如中文的“数学”一词也是西文 *mathematics* 之近代翻译,但我们实在很难说中国过去没有数学。“哲学”的情况与此类似,但更为复杂,因为“哲学”是西方文化中含义最复杂的概念之一。

面对“哲学”一词的复杂含义,有些学者试图借由对比的方式来界定它,譬如将它对比于“智慧”、“宗教”或“科学”。但对比即同时意谓关联。众所周知,希腊文 *philosophia* 的原义即是“对智慧的爱”。而在中世纪,哲学是神学的婢女。还有学者强调哲学与科学的关联,如德国学者伯梅(Gernot Böhme)便认为:“哲学是一条通往智慧的特殊道路。这条道路的特殊之处在于知识在此应有的角色,而且这种知识即是科学,或者至少倾向于科学。”^⑮对比的方式有明显的局限,因为:第一,当我们强调哲学与“智慧”、“宗教”、“科学”之对比时,即同时承认它们之间的关联,故在历史的脉络中,其间的界线往往是模糊的、移动的,而非泾渭分明;第二,借由强调“哲学不是什么”,我们并无法在“何谓哲学”的问题上得到多少启示,正如

^⑫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一卷:七世纪前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5页。

^⑬ 见《明治文学全集3:明治启蒙思想集》(东京:筑摩书房,1967年),第23页;参阅小岛毅:《“儒教”与“儒学”涵义异同重探——新儒家的观察》,收入刘述先编:《儒家思想在现代东亚:中国大陆与台湾篇》(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2000年),第202—206页。

^⑭ 戴卡琳:《究竟有无“中国哲学”?》,前引书,第6页;英文版,第395页。

^⑮ Gernot Böhme: *Einführung in die Philosophie. Weltweisheit-Lebensform-Wissenschaft*, Frankfurt/M. Suhrkamp, 1994, S. 22.

“否定性神学”(negative theology)无法提供多少关于上帝的知识。此外,还有学者建议将“哲学”视为一个具有“家族类似性”(Familienähnlichkeit)的概念^⑩。这固然不失为一种权宜之计,因为这可以使“哲学”保持为一个开放的概念,但我们不应满足于此。

检视关于中国哲学的正当性问题之讨论,笔者发现:对“哲学”一词采取较严格定义的人往往忽略了一项重要的区别,即“作为思想传统的哲学”与“作为现代学科的哲学”之区别。那些强调所谓“中国哲学”是近代中国人根据西方哲学的模式建构起来,因而主张以“哲学在中国”取代“中国哲学”一词的人便是如此。当我们谈到“希腊哲学”时,我们基本上是将“哲学”视为一个思想传统。但在当前西方大学的哲学系,“哲学”是一个学科概念,是西方大学自17世纪以后持续进行的学科分化之产物。以“哲学”这个概念来说,其含义在17世纪是极为宽松的。因此,莱布尼兹(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 1646—1716)很自然地谈到:

有谁曾相信:在地球上有一个民族,在一种更有教养的生活之规则方面,超过我们(我们的确自以为已因教育而完全拥有一切精致的道德)?但自从我们认识了中国民族之后,如今我们在中国人身上见到这一点。因此,如果我们在手工技巧方面与他们不相上下,而在理论科学方面比他们优越,但在实践哲学的领域当中——我是说:在针对人本身的生活与日常习俗之伦理与政治学说当中——我们确实相形见绌,而承认这点几乎令我汗颜。^⑪

无怪乎其后继者沃尔夫(Christian Wolff, 1679—1754)会有《论中国人的实践哲学》(*Oratio de Sinarum philosophia practica*, 1726)之作。到了康德(Immanuel Kant, 1724—1804),他已不再谈论“中国哲学”了。但即使如此,“哲学”作为学科概念的含义依然相对宽松。因此,身为哲学教师,康德在柯尼希贝尔格(Königsberg)大学还可以讲授物理学、机械学、数学、自然地理、法学、教育学、人类学等课程。这在现代的大学是不可想象之事。过去已有不少学者论及黑格尔对“中国哲学”的否定,直到今天,他的看法仍深深地影响西方人的中国观。笔者不想再重复类似的讨论,而只提出一项事实:即使到了19、20世纪之交,“哲学”作为学科概念的含义还是比今天宽松得多。譬如,蔡元培(1868—1940)曾于1908至1911年间就读于德国莱比锡大学,上了冯德(Wilhelm Wundt, 1832—1920)的哲学课。但冯德本人也是心理学家,在莱比锡大学建立了世界第一所实验心理学研究所。由此可见,当时哲学与心理学还有密切的关系,尚未完全分家。

^⑩ 戴卡琳:《究竟有无“中国哲学”?》,前引书,第6页;英文版,第407—409页。

^⑪ Leibniz: Vorwort zu *Novissima Sinica*, in Adrian Hsia (Hg.), *Deutsche Denker über China*, Frankfurt/M. Insel, 1985, S. 11.

1905年清廷废止传统的科举制度。在此之前,清廷已开始模仿西方,建立现代的教育制度。1902年清廷颁布各级学堂之章程,称为“钦定学堂章程”,亦称“癸卯章程”。1903年清廷命张之洞会同张百熙、荣庆重新拟定各级学堂章程,而称为“奏定学堂章程”,于次年颁行。这是中国第一个现代学制。“奏定学堂章程”将哲学排除于高等学堂的课程之外,而引起王国维的批评。王国维于1903年发表了《哲学辨惑》一文,他在文中强调:一、哲学非有害之学;二、哲学非无益之学;三、中国现时研究哲学之必要;四、哲学为中国固有之学;五、研究西洋哲学之必要^⑧。如果说日本学者西周所指涉的“哲学”是“作为思想传统的哲学”,则我们可以说:王国维在这篇文章中已涉及了“作为现代学科的哲学”。

在笔者看来,在关于中国哲学的正当性问题之讨论中,不少争论系起源于作为“思想传统”而相对宽松且具开放性的“哲学”概念与作为“现代学科”而日趋狭隘的“哲学”概念间的张力。厘清了两者间的分际,不少争论便可以得到化解。譬如,许多论者都提到“中国哲学”与“哲学在中国”之区别^⑨,我们可以代之以“作为思想传统的中国哲学”与“作为现代学科的中国哲学”之区别。这样一来,我们固然可以主张中国历史上确实存在“作为思想传统的中国哲学”,但这无碍于同时承认“中国哲学”这门学科是近代中国人根据西方的模式“建构”起来的。进而言之,就“作为现代学科的哲学”而言,在中国的大学里以回溯的方式将“中国哲学”建立为一门学科,自然有其正当性。

在借由“作为思想传统的哲学”与“作为现代学科的哲学”之区别厘清了部分争论之后,我们还是得面对“作为思想传统的哲学”所包含的复杂含义。在西方,就其为思想传统而言,“哲学”这个概念包含一个长期的演变过程,在不同的时期呈现出极为不同的面貌。否定中国过去有哲学的学者经常诉诸一项对比:中国传统“思想”偏重实践智慧与道德功夫,而西方“哲学”偏重理论思辨与方法反思。不少西方学者(如伯梅)强调这种对比,甚至有些中国学者也呼应此说。但这其实是对西方哲学传统的窄化。

^⑧ 姚淦铭、王燕编:《王国维文集》(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3年),第3卷,第3—5页。此文原刊于《教育世界》第55号(1903年7月)。

^⑨ 除了傅敏怡的上述观点之外,另请参阅:李翔海:《20世纪中国哲学的三种基本理论范式述评》,《河北学刊》,2004年第4期,第14—17页;李翔海:《“从哲学在中国”到“中国的哲学”——“中国哲学”发展历程的回顾与展望》,收入景海峰编:《拾薪集:“中国哲学”建构的当代反思与未来前瞻》(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第307—321页;郑家栋:《“中国哲学”与“哲学在中国”》,《哲学动态》,2000年第5期,第27—30页;劳思光:《“中国哲学”与“哲学在中国”》,收入劳思光著、刘国英编:《虚境与希望——论当代哲学与文化》(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5—31页。

针对这种误解,法国哲学家哈窦(Pierre Hadot, 1922—)在其名著《精神训练与古代哲学》^{②①}中特别强调在西方古代哲学(希腊、罗马哲学)中“哲学作为生活方式”(philosophy as a way of life)的意义。此书的英文译本题为《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哲学:从苏格拉底到福柯的精神训练》^{②①},德文译本题为《作为生活形式的哲学:古代的精神训练》^{②②},更能显示此义。哈窦根据西方古代的哲学文献极有说服力地证明:在古代西方,哲学主要是一种“生活方式”。他认为:一般人对西方古代哲学的误解系由于后代的哲学史家将“哲学”与“关于哲学的论述”(discourse about philosophy)混为一谈,而将“关于哲学的论述”当做“哲学”本身。根据他的解释,“哲学作为生活方式”之义的失落在中世纪与近代都有其历史根源:在中世纪,归因于哲学被工具化而成为神学的婢女;在近代,则归因于哲学被纳入大学体制而学科化^{②③}。

康德哲学往往被视为上述狭隘的“哲学”概念之代表,其实他在其“实践理性优先于思辨理性”的观点中却保存了“哲学”在西方古代哲学中的原义。他在《实践理性批判》的《辩证论》中谈到“最高善”的理念时写道:

在实践方面,亦即,为了我们的理性行为之格律而充分地决定这个理念,便是智慧学(Weisheitslehre);而将智慧学当做学问(Wissenschaft)来看,又是依古人所理解的意义而说的“哲学”——对古人而言,哲学是对有关“最高善应置于何处”的想法及借以求得最高善的行为之指引。^{②④}

康德在这里所说的“古人”便是指希腊化罗马时期(Hellenistic-Roman period)的哲学家,特别是斯多学派(Stoicism)与伊壁鸠鲁学派(Epicureanism)。这种看法已由哈窦的研究得到了佐证^{②⑤}。无怪乎哈窦会说:“我现在觉得……在(西方)古代的哲学态度与东方的哲学态度之间确实有惊人的类似之处。”^{②⑥}根据哈窦对西方古代“哲学”概念的重建,即将“哲学”界定为一种“生活方式”,谁能否定中国过去有长

^{②①} P. Hadot: *Exercices spirituels et philosophie antique*. Paris: Etudes Augustiniennes, 1981.

^{②②} P. Hadot: *Philosophy as a Way of Life; Spiritual Exercises from Socrates to Foucault*. Translated by Michael Chase, Oxford: Blackwell, 1995.

^{②③} P. Hadot: *Philosophie als Lebensform. Geistige Übungen in der Antike*. Berlin: Gatza, 1991.

^{②④} 参阅 P. Hadot: *Philosophy as a Way of Life*, in *Philosophy as a Way of Life; Spiritual Exercises from Socrates to Foucault*, pp. 264-276.

^{②⑤} I. Kant: *Kritik der praktischen Vernunft*, in *Kants Gesammelte Schriften* (Akademie-Ausgabe), Bd. 5, S. 108.

^{②⑥} 罗哲海也注意到康德与哈窦对“哲学”古义的理解与强调;参阅其 *Gibt es eine chinesische Philosophie?*, op. cit., S. 31f.

^{②⑦} P. Hadot: *Qu'est-ce que la philosophie antique?*, Paris: Gallimard, 1995, p. 419.

远而丰富的“哲学”传统呢？

有些学者(尤其是中国学者)之所以反对将“哲学”一词应用于中国传统的思想,是担心这会使它丧失主体性与独特性。当然,他们可以继续使用“经学”、“子学”、“玄学”、“理学”之类的传统语汇。在清末学术转型的过程中亦不乏类似的观点。这种观点反映于“奏定学堂章程”,即是在大学堂的课程中设有“经学”科,而无“哲学”科。如果我们同意哈奚对于西方古代“哲学”概念的界定,这种主体性的焦虑便可以卸除大半,而转变为关于“现代的学科体制能否充分掌握传统的哲学”之省思;而这又不可避免会回到哈奚对于“哲学”与“关于哲学的论述”——或者说,第一序与第二序的“哲学”概念——之区分。但这已不是一个“西方与非西方”的问题,而是一个“现代与传统”的问题。由于人类现代化的历程始于西方,这两个在历史脉络中虽有关联,但基本性质不同的问题往往在有意无意间被混为一谈。再者,由于中国现代学术体制之建立系仿自西方,现代汉语的学术语言在相当程度内已成为西化的语言。面对这个事实,除非我们拒绝现代学术体制,否则我们实无理由因担心主体性之丧失而拒绝将“哲学”一词应用于中国传统。这种主体性的焦虑不但有错置对象之嫌,也是不合时宜的。走笔至此,笔者不得不佩服王国维在百年之前的洞见。差堪告慰的是,在进入 21 世纪的今天,全球化的进程已使得包括西方文化在内的所有人类文化均不可能不受到其他文化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从西方文化的立场坚持一种僵化的“哲学”概念,同样是不合时宜的。*

(作者单位: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

* 在这个问题上学术界有一系列研究成果值得关注,作者曾将这些论文和著作一一列出,但考虑篇幅过长,这里删去。——编者注



知网查重限时 7折 最高可优惠 120元

本科定稿，硕博定稿，查重结果与学校一致

立即检测

免费论文查重：<http://www.paperyy.com>

3亿免费文献下载：<http://www.ixueshu.com>

超值论文自动降重：http://www.paperyy.com/reduce_repetition

PPT免费模版下载：<http://ppt.ixueshu.com>

阅读此文的还阅读了：

- [1. 守法:一个需要哲学考量的法律问题](#)
- [2. 管制吸毒的正当性:一个值得重视的全球性的中国问题](#)
- [3. 论中国哲学的基本问题](#)
- [4. 谈谈中国哲学与“浙学”若干问题](#)
- [5. 一个幼儿的哲学问题](#)
- [6. 中国哲学关于人的自由问题的研究](#)
- [7. 中国问题与中国当代哲学](#)
- [8. BEING:当代中国哲学的一个基本问题——从《BEING与西方哲学传统》说起](#)
- [9. 一个关于推举的问题](#)
- [10. 新民与亲民——作为中国古代政治哲学的一个问题](#)
- [11. 关于“中国哲学”的若干问题浅议](#)
- [12. 关于当代中国社会发展代价问题的哲学思考](#)
- [13. 批注? 对, 批注!](#)
- [14. 中国哲学面对的现实问题](#)
- [15. 《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编辑忆往](#)
- [16. “中国有无哲学”问题笔谈-中国有没有“哲学”?-一个涉及文化比较的方法问题](#)
- [17. 关于中国哲学生态观的几个问题](#)
- [18. 中国古代关于物的哲学](#)
- [19. 关于哲学的开端问题](#)
- [20. 美是不可分析的——评道禅哲学关于美问题的一个观点](#)
- [21. 关于“中国哲学之正当性问题”的一个批注](#)
- [22. 关于“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的两点思考](#)
- [23. 一个关于责任的问题](#)
- [24. 电车难题：一个关于对与错的哲学谜题](#)
- [25. Bar,一个关于钓鱼的问题](#)

26. 关于哲学的十个问题
27. 中国哲学关于人的自由问题的研究
28. 关于技术哲学的五个问题
29. 重提“中国哲学”的正当性
30. 管制吸毒的正当性:一个值得重视的全球性的中国问题
31. “性”与中国哲学基本问题
32. 论中国哲学的基本问题
33. “存在”何以成为一个“问题”——对当下中国哲学语境中“存在”问题的解读
34. “生成-中国”：一个地理哲学的视角
35. 中国哲学固有问题的探寻
36. 中国哲学的基本哲学问题与概念范畴探究
37. 电车难题:一个关于对与错的哲学谜题
38. 和谐理论中的一个重要哲学问题——关于绝对矛盾和相对矛盾问题的探索
39. 中国哲学关于“尊严”问题的认识
40. 中国有没有“哲学”?--一个涉及文化比较的方法问题
41. 中国哲学：问题、特质与方法论
42. 婚姻正当性法哲学基础的探讨
43. 作为一个问题域的发展哲学
44. 一个哲学家的人生批注
45. 关于构建中国哲学的若干问题
46. 关于乘数的一个问题
47. 论刑事案件速裁程序的正当性——一个实用主义哲学的视角
48. 中国哲学的基本哲学问题与概念范畴
49. 中国近代以来的政治正当性问题
50. 关于中国哲学的几个问题